



风雨同舟 共铸辉煌

——纪念高邮政协成立 60 周年征文选登(四)

逝去的身影

□ 市政协第九届副主席 尤泽勇

1998 至 1999 年，我任高邮市政协副主席，同时任市委统战部长。短短两年，对政协工作的意义有了深刻了解，自己也结交了一批新朋友。

褚元仿是高邮籍上海文化人，为家乡办事热心，王氏纪念馆程十发绘王氏父子像和文游台前严友人塑景观铜像，都由他热心牵线，被誉为“自费高邮驻沪大使”。他与前任部长朱维宁是好朋友，我到任后，老部长介绍我与他结识。

褚公每年回乡一两两次，每次小住个把月，大街小巷到处走，鸿儒小贩都接触，自诩他看到听到的，我们不一定知道。每次聚会都拿我们当朋友，没有客气话，不是介绍外面世界的精彩，就是对家乡建设提出建议，几乎都是他包场。他很早就鼓动高邮要举办新春音乐会，邀请知名乐团，与大城市、与世界文化接轨，要交响化，让高邮孩子不仅知道二胡；有一阵见面就说“汪曾祺是品牌，东大街是城市记忆”，呼吁尽快修建汪曾祺故居，期待“什么时候能与汪曾祺联系成活的大淖啊！”虽是七旬老人，却声音朗朗，侃侃而谈，从时政热点、理论动态到历史掌故、人物传奇，无不知晓。他自认为小城闭塞，将传播作为回乡的任务，也是对家乡的贡献。外界不尽以为然，友好者调侃他“忧国忧民”，苛难者说他“好为人师”。至于口无遮拦，臧否人事，更是难免得罪人。他有所察觉，为之苦恼，归结为小城太少现代气息，而多的是“叽叽喳喳”，格局不大，颇为家乡观念闭塞滞后着急。作为在上海出生的旁观者，当然能看出他的观念、作派与小城的落差，从中作些劝慰转圜。而观念更新非一日之功，入乡随俗则是亘古不变，谁对谁错？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

我与他有过一次面红耳赤的争辩，是为企业改制和职工买断。他指责改制中“一些人得益，多数人失益”，虽委婉地补充说“全国如此，亦非高邮一地”，但我听不下去，执拗于高邮现状与不之争辩，据理力争；改制伤及无辜却不得不改，政府左右为难不得不为。现在回头想想，他的说法，除有在上海平台积累的信息，出于一种全局考量或理性分析，肯定也有在高邮与民众包括亲友的感性接触，其批评应该有一桩桩有名有姓的个案支撑，虽然他没有细说。这些是当局者不易听到的苦口之良药，逆耳之忠言。平时说要听不同声音，说得好听，事到临头并不合格。至今我仍歉疚。

好在褚公事后并不在意，相反跟我交往更深，建立了正常通信联系。信中除了热心介绍外部信息，推荐好书好文，谈及国事家事，还以自己经历给我启发和提醒。后来看电影《天堂电影院》，有许多老放映员艾费多跟尚未涉世的多多唠叨的镜头，看似平淡的对话包含了老人一生经验。重复看过多遍，总让我想起褚公。

通信延续到他逝世前一周，共计收到 157 封，最后两年每年超过 20 封。与老人通信，也是对“老派文化”的补习。如他来信抬头必是“泽勇兄”，落款“弟褚元仿”，却不让称他褚老，要称“老褚”

至多“褚公”；从右至左竖写，蝇头小字，密密麻麻三四页，纸尽信了；绝少错漏字，从笔迹不同看出时有改动或添上一句两句；来往之密是他见信即回，“见信即回是对人的尊重，是规矩。”

褚公 2012 年元旦遽然离世，享年 83 岁。没有了褚公，起初不觉得，时间长了，都感觉缺了什么。

1999 年 10 月中旬，接到政协转来王沛 10 月 4 日的信，有事需统战部与市政府协调处理。王沛，听说过，没见过，通过办理此事，从别人口中对他身世的了解，竟让我感慨不已。王沛出身高邮名门，民国时期毕业于中山大学农经系，就职新疆省政府民政厅。其妻是高邮董家闺秀，上海大夏大学校花。接踵而至的社会大变动改变了人生。1949 年 9 月新疆宣告和平解放，王沛作为起义投诚人员按政策接收进入新政府机关。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运动中，陡生曲折，蒙受冤屈，戴上反革命帽子坐牢十余年。轮到特赦出狱，安排回高邮老家，由民政局对口接收安置。虽蒙特赦，世人仍另眼相看，被安排在一般人不肯去的殡仪馆。一个曾经的高材生，年近六旬孤零零地住在传达室看门，日复一日以度余生。熬到平反落实政策，调到公园，换个地方仍然看大门，政协吸收其为委员。退休后离开高邮去武汉与妻子儿女一起生活。

就是这样一个多年蒙受冤屈、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老人，平反后，用落实政策补发工资 1 万元，创立高邮中学农业院校考生奖学金。1 万元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笔大钱，时称办厂做生意的成功者为“万元户”。他生活节俭，并不宽裕，子女也不同意，但他坚持要做。他说，社会对学农有偏见，而农业很重要，设奖学金是用个人微薄之力作点引导。每年放假，获取奖学金的孩子回邮都要与他相聚，这是他最幸福的时刻。后来利率下调，1 万元所得利息不够安排，有人婉转地建议他可以收手。而王沛坚持不渝，表示愿以退休工资补足。

接收他的信没几天，10 月 28 日突然得到王沛老于 27 日晚在武汉去世的噩耗。部里与政协当即商量，派副部长吴庆云和政协、民政局的干部作为代表，第二天去武汉吊唁治丧。吴部长回来后动情地说，董奶奶和孩子非常讲理，没有提半点份外要求，除丧葬费外，不要单位支出一分钱，全部自理。王沛奖学金坚持按他生前愿望不撤。由于利息不足以再支持，明年发一年后，余款选择资助部分下岗职工子女入学，一次性解决完。

多年后，在《高邮日报》副刊读到陈永平写王沛老的散文。陈跟他做过邻居，写了一些切身经历的细节，生动真实，很是感人。当时我不由想到了王沛奖学金，想到了殡仪馆看门，想到了他那封信……

香港居民熊先生，原籍高邮甸垛，弟兄四个，两个去了香港，两个留在高邮，依“荣华富贵”取名，熊先生老大，名叫熊家荣，我结识他时他年已七旬。熊

先生在香港理发，一辈子在湾仔挣了一间两层上下的门面，雇几个师傅，熊先生收账，熊太太打杂，扫地抹桌子，小本经营，小康之家。熊先生夫妇生活俭朴，一口家乡话，没多少文化，说的都是朴素的家常话，还真分不出是香港人还是大陆人。刚到政协那年 6 月，他夫妇捐资 14 万元为家乡修建从庄台到公路的水泥路，取名“思乡路”，邀请我去揭牌。别人告诉我，熊先生对家乡常有善举，前一年捐资 20 万元建了庄台内道路、桥梁和幼儿园。

自此与熊先生交上了朋友，每次回高邮会邀我相聚，每年大年初一，都接到他恭贺新年的电话。熊先生年龄比我大很多，让他给我打电话太不合适，我特意要了他家电话，年初一提前给他拜年。不料，电话拨不通香港，无奈只有等他电话。我退休后，他回邮聚会还邀请我，一晃已有几年不见。写此文时特意了解，熊先生于今年春季逝世，享年 91 岁。

还有一个退休老教师，既没见过也不知道名字，但她的事迹却铭记在心，不得不写。

一次听部里同事说“那个费老师又来过了”。说得含糊，但他们都心知肚明，很是熟悉，只有我不解。哦，原来是一个退休教师，也是统战成员，自希望工程设立起，年年捐款；她不知往哪儿捐，就到“娘家”统战部，每年一次，一次捐 1000 元（1990 年代初期，月薪在百元上下），一年不空，已近 10 年。她年事已高，行走不便，每次来都坐三轮车，颤巍巍地下车交钱。我跟同事说，下次来告诉我一下。可没等到下次，我调离统战部。

这些平凡的人和不平凡的事，什么时候只要说起，都让我感动。有时我想，他们虽然不是中共党员，不是领导干部，或许还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在这些事情上表现出来的品格和操守的高度，即使有些党员或领导，也未必能够达到。央视每年做个“感动中国”特别节目，这些人也是能够“感动高邮”的。

刚到统战部时，有人说，你当过有权部门（市委办）有钱部门（经委）领导，统战部无权无钱，不好干啊！我一时无言以对。入门之后，越来越看到政协统战的优势所在，而且是其它地方所没有的，那就是人，就是有很多肝胆相照的朋友。做政协统战工作，将中共的政策、关心送给他们，帮助他们解决具体困难，为党凝聚人心，凝聚力量，这是一股多大的力量啊！同时，从与他们结交中，感受到他们散发出来的人文情怀，学到他们的人格操守。

老部长朱维宁退休后写起散文，在报刊发表一篇接一篇，写了不少统战成员，亦即他结交的朋友。一次我傻傻地问他：“你这样写，会不会写完啊？”他乐呵呵地说：“一时写不完，肚子里货多呢！”写这篇文章时，想起老部长写过的文章写过的人，想起他说的“写不完”。我在政协（统战部）时间短，交友没他深，但也有不少人和事时常激荡在心，鞭笞自己，借着纪念高邮政协 60 周年，以此拙文谨表纪念和致敬。

我曾任高邮市政协第十届、第十一届委员，这 10 年中有 7 年是在市信访局任局长。现在想来，正是有信访局这样一个特殊岗位，为我作为一名市政政协委员担职、履职、尽职提供了广阔舞台和不竭动力，所作所为，点点滴滴，让我倍感欣慰。

勇于担当，为的是保障退休职工应该享有的权益。记得我任市政政协委员不久后的一天早上，还没到上班时，市政府门前就聚集了许多上访的老人。经了解，这部分人员都是乡镇农具厂的退休职工，全都办理了退休手续，也按月领取过养老金。后来农具厂下放给乡镇管理后，养老金停发了，他们的生活便没有了着落，只得上访求助。我以市信访局局长、政协委员的身份接待了他们中的代表，得知这部分老同志都属大集体性质的职工，养老保险金由主管局统筹。当初局领导认为，系统内退休职工少，效益好，把已经收取的养老保险金交给市里大统筹太吃亏了，便决定仍由系统内统筹，系统内发放。谁知不久，随着退休职工人数的增加，效益又大不如前，不能按时足额缴纳养老保险金的农具厂越来越多，眼看快要无力发放了，市里一纸文件便将农具厂下放给所在乡镇管理，对退休职工养老金怎么发放也没有具体明确要求，就出现了退休职工上访要求享有退休待遇的情况。对此，我认为，退休职工因为养老金问题上访是有道理的，错就错在原主管局当初没有及时将这部分人员养老保险金划归劳动部门统一管理，而有关部门又监管不到位。于是，我通过市政协《社情民意》反映了这一情况，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通过退休职工拿一点，乡镇挤一点，市财政补一点的办法，为全市 200 多名原农具厂退休职工补交了相关费用，使得他们享受到了城镇退休职工的同等待遇，解除了养老之忧。

积极履职，为的是规范我市服装加工市场秩序。我市获得“服装制造名城”后不久，冲着这个金字招牌，大小小服装加工厂遍及城乡，上海、浙江、苏南等外地加工订单蜂拥而至，这红火的背后却带来一系列隐患和问题：一是企业恶性竞争，互挖墙脚，人为造成用工荒。二是随意涨价，不讲信用，扣物加钱。三是欠薪逃匿，坑害职工等乱象丛生，以至加工订单锐减，高邮对外形象受到了很大损害。作为一名市政政协委员，我陷入了沉思之中：金字招牌千金难买，我有责任、有义务为规范我市服装加工市场秩序作出自己的努力。于是我多次到企业、有关部门和职工中座谈了解，找准问题症结，共同研究对策措施。通过几个月的奔波调研，我撰写了《关于打造我市诚信服装企业的几点建议》，很快得到了市政协领导的重视和支持，转交市政府相关部门研究办理。由于提案既有情况分析，又有对策措施，市政府很快出台了专门文件，组建了市服装协会，建立了工资保证金制度，并对个别不良企业采取了整顿或关停等措施，一度困扰我市服装市场的乱象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全力尽职，为的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医患矛盾纠纷愈演愈烈，已经成了全国上下共同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7 年前，我市医闹现象也很突出，在医院摆花圈、设灵堂、烧纸钱，围堵进出通道等现象时有发生，还有一些社会闲杂人员掺杂其中起哄闹事。如何维护医院正常的医疗秩序，构建起和谐的医患关系？我几次去医闹现场，认真听取医患双方以及旁观者的意见建议，发现造成医患矛盾纠纷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医疗事故发生后，医方态度一般不是很积极，有的甚至无人过问，患者一方只得通过闹（有理闹、无理也闹）才能引起院方和相关部门重视，即所谓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二是没有一个客观公正的第三方不偏不倚地确定责任、处理问题，医患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三是信息不对称，患者一方常常处于被动、弱势地位，没有时间和精力通过诉讼程序来正常维权。于是，我在市十一届政协会议上提出了《关于构建我市和谐医患关系的建议》，并被列为当年重点提案，进行了交办、督办。在市领导的高度重视下，我市成立了第三方性质的医患纠纷调解委员会，并组织相关人员赴天津市跟班见习，市医患纠纷调解委员会实际运行后，情况大有改观，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都得到了有效维护，医院的秩序也大为改善。市医患纠纷调解委员会自成立以来，已成功调处纠纷 84 件，为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担职 履职 尽职

□ 市政协第十一届委员 黄安良